

+

书评季刊

孙瑞达

本期要目

中国传统文化名著简评

- 亘古男儿一放翁——《陆游集》
- 逸响伟辞 卓绝一世——《楚辞》

西方学术名著展评

- 列宁：《国家与革命》
- 麦克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现代书评

- 没有哪个年代的青春是轻松的——读王安忆《启蒙时代》
- 真实的平凡——评小说《平凡的世界》
- 朱德庸二十年最好玩的一本书——《绝对小孩》

名师访谈

- 丹青难写是精神——杜元虎教授访谈
- 倾心育桃李 真情写春秋——徐国凯教授访谈

2009

1

书评季刊

第六卷 第1期 (总第21期)

《书评季刊》编审委员会

主任：张英福

副主任：包和平 王秀文

成员：

李 鸿 段晓东 马 林 徐国凯 王培昌

姜国斌 刘勇奎 刘向东 马春东 王庆春

江 远 王立冬 谢 光 杜智殊 田 森

南文渊 刘江龙 王学艳 徐辑彦

主 编：包和平

千古男儿一放翁

《陆游集》

包和平

《陆游集》，宋陆游作。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南宋时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生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卒于嘉定三年（1210）秋天。幼年陆游正逢宋朝国运处于暴风雨即将来临之际，金兵南下迫使陆游长期过着逃难生活，这给他带来了心灵上的震撼，所以他说：“少小遭丧乱，妄意忧元元”，终身主张驱逐金兵，收复失地，解救沦陷区百姓的痛苦，其思想根源于此。宋高宗对内残酷压迫、贪暴；对外妥协、软弱无力；秦桧卖国求荣，偏安一隅，如此黑暗的现实让陆游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给他以极其深刻的教育，使他能够爱憎分明。再者，当时来往于陆家的还有很多优秀的文人学者，他们常常在漫漫的长夜和陆宰灯下长谈，论述着诗文的流派和创作上的诸多问题，对少年陆游的学习是个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复次，陆游是个相当聪敏的孩子，自小热爱学习，“我生学即耽书”，从小对书产生了浓厚的感情。绍兴三十二年（1162），陆游参政，并积极抗战，由于他参加了实际的生活和斗争，因而感受颇深，他的诗作内容充实，感情热烈，风格豪迈，包含了丰富的爱国主义情感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陆游集》，包括《剑南诗稿》85卷，附录续稿；《渭南文集》50卷。共收录诗歌9300多首。因为纪念在蜀生活，故名。有逸稿2卷。

陆游的诗歌反映了诗人的志向，这些诗篇是诗人内心感情的流露，比如陆游书写早年抱负时说：“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书叹》中说：“少年志欲扫胡尘”，《金错刀行》讲：“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至老壮志未泯，有抒发82岁的豪情的诗句：“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燕赵是战国时代两个国家，在今河北、山西一带，此指被金兵占领的北方），再如“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晚年的《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成为千古传诵的名作，可见他自小至老始终不渝的爱国和报国的壮志情怀。

《剑南诗稿》很多诗篇，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而且比较进步的是，他的爱国思想不仅仅是忠于宋朝皇帝一家一姓，而是以国家和民族为重。当时金兵南下，宋室仓皇南逃，很多北方百姓急切希望宋军北上收复失地，但总是希望落空。陆游有诗：“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大诗人将黄河比喻三万里长，将西岳华山比喻五千仞高，用夸张的手法形容祖国山河的壮丽，但却失之他人之手，诗人感到不无痛惜，尤其对沦陷地区百姓的痛苦生活和焦急迫切心情的感触极其深刻。正是由于陆游进步的观点，因此他对当时社会的现实看的非常透彻明了。《关山月》有诗句讲：“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弦断。”下面还有“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本诗反映各种关系，宋孝宗隆兴二年向金人和约后，朱门酣歌醉舞，醉生梦死，甘心屈辱地向金人称臣纳贡；但战士却极力希望战死沙场；北方遗民则翘首以待，盼望宋室收复失地。从中可以对当时阶级状况、社会现实状况、民族矛盾有清楚的认识，也包含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悲愤之情。同时陆游还为百姓大声疾呼，“富豪役千奴，贫老无寸帛”，多么鲜明的对比！陆游诗歌同情人民生活，《农家叹》讲“门前谁剥啄？县吏征租声，一身入县庭，日夜穷笞榜。”揭露了地主的剥削和掠夺，反映了劳苦大众受到的残酷压榨，表达了为民呼吁的心声！

再次，陆游诗篇表达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很多是描写了壮丽的自然山河，格调清新俊

逸。《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还有《临安春雨初霁》“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作者笔下的农村生活热闹而不乏和谐，向世人展示了景色绚丽的画幅，给人如临其境之感。晚年陆游二十余年的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从事一些农业劳动，能够和百姓走到一起，这一段时期，他对百姓有更深刻的认识，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尊重和重视，这在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少见的，也是非常可贵的。

《渭南文集》内分文集 42 卷，《入蜀记》6 卷，词 2 卷。陆游曾经封渭南县伯，故名。陆游散文也相当著名，有些作品能够畅快淋漓地表达他的爱国之情。比如《静镇堂记》、《书渭桥事》等等，风格沉雄悲愤有力度，从中也不难看出南宋的时代特征。另外还有些闲适情趣之文，《居室记》就是 1 篇。《入蜀记》则是陆游日记体的散文，陆游 45 岁时受命去四川做通判，他沿着长江行进，经过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又过形势险峻、江流湍急的三峡，他将一路上所见历史古迹、名山大川、民情风俗等都写进了日记里，从而《入蜀记》成为一部优美的散文游记，并且是研究历史地理的参考书。

陆游诗歌用语通俗易懂，有说服力、有感染力，所谓“清空一气，明白如话”就是这个意思。陆游对词句的选择也相当慎重，经常反复修改，比如《剑南诗稿》其中多篇诗文就被淘汰掉了，现在所见大都艺术成就颇高。他的诗气势恢弘，词句精练，结构谨严，篇幅短小精悍，意味深远，因而备受后人称颂。

陆游活了 85 岁，由于他长期地、辛勤地播种，给我们留下了将近 10,000 首诗作和其他作品，数量上是古代诗人中首屈一指的，质量上也达到了一个高峰。《陆游集》中的《剑南诗稿》、《渭南文集》都有《四部备要》本。1976 年，中华书局有校点本《陆游集》，包括《剑南诗稿》和《渭南文集》。

“楚辞”是战国后期楚国屈原等人创作的诗歌，是当时产生的一种富有南方地方特色的新诗体。“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前期。汉人称之为“辞”或“辞赋”。因为《楚辞》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屈原的《离骚》，所以后人也以“骚”来指称《楚辞》。从汉代开始，“楚辞”成为屈原等人作品的总集名，此时，“楚辞”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为帝王所喜爱并且与六经并重。《楚辞》是继《诗经》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共 16 卷。原有 16 篇，包括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宋玉的《九辩》，景差的《大招》，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和刘向的《九叹》，其中《远游》、

《卜居》、《渔父》3 篇是否屈原所作尚未定论，《招魂》一篇近人多认为当出自屈原之手。东汉王逸为《楚辞》注释又增入己作《九思》，遂成 17 篇。

楚地的风谣叫“南音”，其狭义即为“楚声”。屈原的辞赋是采用赋的调子，又吸取了“南音”而成的。“楚声”的音调“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语言上惯用“兮”字。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都是依楚声而作。“楚辞”之作是本于楚地风谣，由屈原扩展为长篇巨制。其直接渊源应是《九歌》。《九歌》相传

夏代已经出现了，当时还只是神话性质的。流传到战国，由于楚地巫风极盛，就沾染了浓厚的巫术色彩，成为当时祭祀的巫歌。屈原根据这类巫歌修改、加工成为现存的



《九歌》，从现存的《九歌》来看，其中含有浓厚的巫歌色彩，虽经屈原润色、修饰，但加工的成分并不多。屈原加工过的《九歌》是合乐的，至汉朝仍在传唱。

屈原（公元前339—公元前278），本名屈平，原是他的字。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史记·屈原列传》说他是“楚之同姓”，但就亲属关系上说，他和楚王已比较疏远。他幼年贫贱，他的《惜颂》说：“忽忘身之贱贫”，可能早年在郢都附近的乡村居住过。东方朔《七谏》说：“平生于国，长于原野。”后来做了楚兰台宫的文学侍臣，曾以侍臣身份跟随楚王游猎。《史记·屈原列传》说他：“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得到楚王信任提为左徒。外交上屈原主张联合七国“合纵”抗秦。曾东使于齐，并促成楚国联合五国攻秦，诸侯推怀王为“纵长”。内政上他力主改革，把举贤授能、修明法度作为政治准则。由于触犯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屈原遭到中伤，被怀王疏远失去左徒职位，任闲官三闾大夫。怀王十七年，怀王被秦国的张仪所骗，与齐国绝交，后又恼羞成怒，兴兵伐秦，遭到彻底失败。不得已又派屈原出使齐国，齐楚复交。然而秦昭王初立，与楚国定“黄棘之盟”，再次背齐合秦，屈原也被流放汉北。楚国内政腐败，在外又连吃败仗，秦昭王乘机约怀王入秦会盟，并扣留怀王。怀王最终死在秦国。楚顷襄王立，屈原痛恨子兰劝怀王入秦，遭到子兰和上官大夫的诋毁，被顷襄王怒迁江南。278年秦将白起攻拔郢都，烧毁楚王先墓，顷襄王逃往陈城。屈原在楚国南部辗转漂泊，忧愁幽思，终不能忘怀国事，最后在绝望中怀石自投汨罗江而死。

宋玉是屈原以后重要的楚辞作家，后代人常以“屈宋”并称。宋玉在屈原之后，主要活动在顷襄王时期，好善辞赋，仿效屈原的作品进行创作。宋玉出身低微，性格软弱，仕途不顺，作品多抒发文人落拓不遇的悲愁。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作品，是带有自传性的抒情长诗，作于屈原见谗被疏，流

放汉北之时。作品前一部分写屈原生平遭遇，自叙家世出身。他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有一个美好的生日，自己既有内美又有修能，为国家利益“奔走先后”，却遭到坏人的谗毁，表现了理想和现实之间尖锐的冲突及诗人为实现政治理想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后一部分诗人在幻想中展开抒情，是对未来道路的探索。他上下求索，结果欲见天帝而不得，欲求美女而无获，欲听从灵氛劝告去国远游，但在乘龙西游中看见楚国故土，终不忍离去，决心以死来殉自己的理想。屈原诗篇中表现最强烈的是爱国主义精神，虽遭到谗毁和打击，仍要为祖国寻求前途和出路，爱恋乡土之情让他欲去不忍，既行又止，终于留在祖国。他的诗与其政治理想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表现了理想和理想的不能实现之间的尖锐冲突。《离骚》具有极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富有个性特点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和集中表现个性的诗篇。它驰骋想象，大量运用传说，将历史、现实、天国、人间相交织，创造出奇特瑰丽、绚烂多彩的幻想世界，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有高度浪漫主义特点。其中“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九歌》中有悼念阵亡战士的祭歌，有对神的礼赞和与神的恋歌。对人物感情刻画细腻，环境描写优美。

《九章》有9篇：《惜颂》、《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多抒写诗人在两次放逐中的经历和思想，表达追求理想怀恋故国的忧思怨愤之情，其精神与《离骚》基本一致。用直接倾泻和反复吟咏的方法抒情，结构跌宕、意味深长。

《招魂》是屈原招楚怀王之魂，借巫阳口气陈说四方上下如何可怕，而故乡如何可爱，劝所招魂魄归来安享。想象奇诡，铺陈华丽，开汉大赋的先河。

《天问》中屈原从宇宙问起，就日月星辰、地理知识发问，从古代传说和历史一直问到楚国，参差错落，生动条理，想象丰富。反映了诗人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和孜孜



以求的探索精神。

《远游》写因遭时混浊，不容于世。而离群遁逸，浮游八极的情形。

《卜居》写屈原被放逐，向太卜郑詹尹提出诸多世道不清、是非颠倒的疑问，借此以宣泄愤世疾俗之意。

《渔父》记述屈原在流放中与一渔父的问答之辞，表现渔父的随波逐流与屈原不向世俗妥协的态度的尖锐对立。

《九辩》是宋玉借古曲名为题，抒发了其“贫士失职”的不平与感慨，是一首自叙性的长篇抒情诗。善于借景抒情融情于景，句法多变，语言优美，诗中有关秋景的描绘，对后世文学“悲秋”传统的形成影响很大。

《大招》内容形式与《招魂》类似，是景差招屈原所作。

《楚辞》各篇语言优美，想象丰富，打破了四言体的诗歌格局，创立了句式参差结构富于变化的楚辞诗体。汉赋就是受楚辞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其寄情以物、托物以讽的手法对我国古代诗文有极大影响，驰骋想象的手法影响了诗歌领域的浪漫主义创作。神话传说的运用启发了后世小说诗歌的创作。宋玉的秋景描写更成为“悲秋之祖”。

《楚辞》的注本很多，较著名的有：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和清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等。



西方
名著
展评

《国家与革命》

◎刘 枫

列宁（1870—1924）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缔造者。

列宁，原姓乌里扬诺夫，生于俄罗斯的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1887年进喀山大学攻读法律，曾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而被逮捕和流放。1891年通过国立大学考试，获得毕业证书。列宁从青年时代就走上了革命道路，曾在俄国国内的萨马拉、彼得堡、西伯利亚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领导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列宁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真正缔造者之一。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列宁一生中的许多岁月是在国外度过的，曾经在瑞士、伦敦、维也纳、巴黎、芬兰和波兰组织和集结革命力量，指导俄国的革命斗争。

他是俄国1905—1907年革命的组织和领导者。列宁领导了1917年的伟大的“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十月革命”后，领导苏维埃政府粉碎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颠覆，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为了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于1919年领导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纲领、计划以及一系列方针、政策，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1924年1月24日，列宁在莫斯科病逝。

列宁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写过许多不朽的著作，其中在“十月革命”以前发表的主要有：《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文中在批判民粹派政治观点的同时，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论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9），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市场、再生产和经济危机的理论；《怎么办》（1902），批判了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和否定政治斗争的观点；《退一步，进两步》（1904），批判了孟什维克机会主义，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国家与革命》（1917），阐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十月革命”

以后，为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写了《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1918）；《伟大的创举》（1919），《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论合作制》（1922）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列宁论述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的重要思想，拟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纲领和方针政策，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

列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他的许多新理论、新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加以发展，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作了深刻的论述。该书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的1917年8—9月写作的。当时，俄国沙皇政府已被“二月革命”推翻，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疯狂镇压革命运动。同时“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公然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对待国家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与革命》除序言外，共分七章：第一章《阶级社会和国家》，论述了国家的本质。第二章《国家与革命 1848—1851年的经验》。第三章《国家与革命 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 马克思的分析》。第四章《续前 恩格斯的补充说明》，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第五章《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论述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两个阶段的理论。第六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揭露和批判了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对马克思国家学说的背叛，严格划清了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待国家问题上的根本区别。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这一章没有写成，保留下来的只有详细的提纲。

关于国家的实质，列宁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武装队伍、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强力工具，它随着阶级矛盾的加深而日益加强。根据一般规律，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代替，只能通过暴力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国家学说的基础。

列宁指出，过去的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机构来代替。“巴黎公社”是由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列宁论述了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国家政权和集中的强力组织，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人民大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自己的社会生活。

关于国家的消亡，列宁论述了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强调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论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发展问题。他指出，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离出来的社会，在各方面还存在着旧社会的痕迹。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由于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在这个范围内取消了资产阶级权利。然而，在生活资料的分配方面，只能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按劳分配的原则，即只能实现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平等权利。这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巨大进步，但这种平等权利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利。在这里，平等权利仍然包含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资产阶级权利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推翻资产阶级之后，人们还不能立即要学会不需要任何权利规范而为社会劳动，而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也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因此，还需要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保卫在事实上存在着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

列宁论证了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在社会主义阶段，只靠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还不能立即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但是，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从而打破旧的分配，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为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创造条件。只有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人们已经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律，能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并且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生产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列宁指出，国家消亡是必然的，但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它的长短将取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

《国家与革命》一书，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阐明的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理论，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张成山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青年黑格尔分子、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麦克斯·施蒂纳（笔名，原名为卡斯帕尔·施米特）的主要著作，写于1843—1844年。1844年10月由出版商奥托·继子德在德国莱比锡出版（出版标明的日期是1845年）。该书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部重要著作，通常也被当作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代表作之一。恩格斯因此称施蒂纳是“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

麦克斯·施蒂纳，1806年10月25日生于德国巴伐利亚的拜洛伊特。他的父亲是制作长笛的技师，家中过着小康以上的生活。施蒂纳两岁时丧父，其母以后改嫁给一个牙科医生，全家搬到西普鲁士。12岁时，施蒂纳又回到巴伐利亚，在那里上中学。1826年，即他20岁时进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神学和古典语言学。当时黑格尔正在柏林大学授课，施蒂纳听过黑格尔的课，也听过著名新教神学家和哲学家施莱艾尔马赫尔、马尔海内克等人的课程。1828—1829年在爱尔朗根大学学习。后来他由于母亲患精神病而休学三年，直到1832年才重返柏林大学，听米歇勒特等人的课。1835年毕业，毕业论文《论教育法》没有获得通过。此后他当过中学的试用教员和女子中学教员。

1842—1844年，是施蒂纳从事创作的全盛时期。1842年施蒂纳开始与青年黑格尔派交往。他结交的有鲍威尔兄弟、梅因、科本、恩格斯等人。马克思是1841年底离开柏林的，所以他们两人从未会过面。恩格斯在1889年曾回忆道：“我同施蒂纳很熟，我们是好朋友。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远非像他在自己的《唯一者》一书中对自己所描写的那样坏，不过多少带点学究气，这是他在教书的年代里养成的。”

1843年，施蒂纳与玛丽·威廉娜·德哈尔特结婚，《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就是呈献给她的。她很富有，带来数万塔勒的财产。1845年用她的钱买了一座奶酪厂，由于经营不善，不到一年就破产了。接着，他的妻子带着怨恨离开了他。1856年6月25日，施蒂纳在贫病中去世。

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哲学基础是极端的主观唯心论、唯我论；该书的核心则是从个人——“自我”、“唯一者”出发的要求绝对自由的极端利己主义。他认为在“唯一者”之外的任何事物都是非现实的、虚幻的；而唯一者的行为准则就是利己主义，“他向来就是抛却除自己之外的一切，因为他估价、评价任何东西都不会大于、高于其自身，简言之，因为他从自身出发并‘返回自身’。”

全书共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标题是“人”。施蒂纳说明所有意识、宗教、道德、法律、真理、国家、社会、人民、民族、祖国、人类乃至世界本身都是旨在通过各种非个人的普遍的东西来奴役个人，都是“否定你自己”的，由此说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本身都是利己主义的，因而“唯一者”当然也是利己主义的。

第二部分标题是“我”。指出了自我彻底解放的道路，即“回到你自己那里去”的道路。

他主张自我的解放不能依靠在自我之外的什么永恒的观念形成原则来实现，而只有使自我君临这些观念或原则之上来达到。显而易见，这种立论结构是模仿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基督教的本质，就分成“宗教之真正的、即本身的本质”和“宗教之不真的”两大部分来分别论述神和人的。与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一样，施蒂纳深受费尔巴哈的影响，特别他对宗教的批判。这一点充分表现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同时，费尔巴哈又是该书批判的一个主要目标。这是因为，施蒂纳的“抛却自己之外的一切”的主张是与费尔巴哈崇拜作为类的存在物的人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施蒂纳也拾起了反宗教的旗帜，然而他是怎样批判宗教的呢？

这里就以他批判费尔巴哈为例作以简单说明。施蒂纳宣称“我是高于一切的”；而费尔巴哈主张个人“不能超越他的类的法则和绝对的本质规定”，故而对于施蒂纳来说，基督教中的神或费尔巴哈所说的人，就都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同样的东西。施蒂纳认为，费尔巴哈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把最高本质由“神”变为“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宗教只不过是基督教的最后变形而已。“对人的敬畏就仅仅是对神的敬畏的一种变化了的形态”。施蒂纳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的依据：“两者都是关系到一个最高本质，至于它究竟是超人的，还是人的本质；这对于我来说，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高于我的一个本质，同样是一个超出我自身的东西，所以是很少有关系的。”施蒂纳还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的人的宗教是比神的宗教更糟糕的东西。费尔巴哈认为：“如果把人代替神，他就找到了真理。不，假若说神给了我们痛苦，那么，‘人’，就能更加残酷地折磨我们。”这就是施蒂纳在该书中使用的一种典型手法：超出我自身的东西即是神圣的东西，使神圣的东西凌驾在我个人之上即是幽灵、任想、固定观念，即是宗教，而宗教则是要加以摧毁的。犹如基督教把神看作是最高存在就是一种迷信那样，政治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人道自由主义分别把国家、社会、人看作是最高存在同样是一种迷信、一种宗教观点。黑格尔把世界精神看作最高存在是迷信，连布·鲍威尔把自我意识看作最高存在也是一种迷信的表现。

当然，施蒂纳在作这样的论述过程中，一开始还借助于儿童、青年和成人所谓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三阶段式的发展，以及按这一模式套用于论述人类的历史（古代人、近代人、自由人），说明唯一者如何把世界据为己有，把世界变成他的所有物；说明利己主义和利己主义者的结合是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诸如儿童与事物打交道，未能摆脱事物，他们的思想只是针对一种事物所产生的思想——与某个事物相联系的思想。青年与纯粹思想（不与任何事物相联系的思想称之为纯粹思想或纯思想）打交道，但未能摆脱思想。成人随心所欲地处理事物和思想，并将他的个人利益置于一切之上。

施蒂纳对国家的看法则是上述观点在这方面的延伸和运用。“国家总是把限制个人、束纳个人和使其服从、使个人臣服于任何一种这里就以他批判费尔巴哈为例作以简单说明。施蒂纳宣称“我是高于一切的”，而费尔巴哈主张个人“不能超越他的类的法则和绝对的本质规定”，故而对于施蒂纳来说，基督教中的神或费尔巴哈所说的人就都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同样的东西。施蒂纳认为，费尔巴哈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把最高本质由“神”变为“人”。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宗教只不过是基督教的最后变形而已。“对人的敬畏就仅仅是对神的敬畏的一种变化了的形态”。施蒂纳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的依据：“两者都是关系到一个最高本质，至于它究竟是超人的还是人的本质；这对于我来说，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高于我的一个本质，同样是一个超出我自身的东西，所以是很少有关系的。”施蒂纳还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的人的宗教是比神的宗教更糟糕的东西：“费尔巴哈认为，如果把人代替神，他就找到了真理。不，假若说神给了我们痛苦，那么，‘人’，就能更加残酷地折磨我们。”这就是施蒂纳在该书中使用的一种典型手法：超出我自身的东西即是神圣的东西，使神圣的东西凌驾在我个人之上即是幽灵、任想、固定观念，即是宗教，而宗教则是要加以摧毁的。犹如基督教把神看作是最高存在就是一种迷信那样，政治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人道自由主义分

别把国家、社会、人看作是最高存在同样是一种迷信、一种宗教观点。

黑格尔把世界精神看作最高存在是迷信，连布·鲍威尔把自我意识看作最高存在也是一种迷信的表现。

当然，施蒂纳在作这样的论述过程中，一开始还借助于儿童、青年和成人所谓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三阶段式的发展，以及按这一模式套用于论述人类的历史（古代人、近代人、自由人），说明唯一者如何把世界据为己有，把世界变成他的所有物；说明利己主义和利己主义者的结合是个人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诸如儿童与事物打交道，未能摆脱事物，他们的思想只是针对一种事物所产生的思想——与某个事物相联系的思想。青年与纯粹思想（不与任何事物相联系的思想称之为纯粹思想或纯思想）打交道，但未能摆脱思想。成人随心所欲地处理事物和思想，并将他的个人利益置于一切之上。

施蒂纳对国家的看法则是上述观点在这方面的延伸和运用。“国家总是把限制个人、束纳个人和使其服从、使个人臣服于任何一种。



没有？年代的青春是轻松的

——读王安忆《启蒙时代》

◎ 宛文红

王安忆是一位值得读者期许和信任的作家，她的每一部新作总是与众不同，即便不是给人以惊喜，但总是会以实实在在的内容或形式呈现在你面前，让你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她又在一个新的层面上进行着精神的和艺术上的探求。她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启蒙时代》就是一例，尽管还是一部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但作品的精神指向则在王安忆以往创作中涉猎不多的。这是一部描写特殊年代、一群特殊年轻人成长的心灵成长的长篇。上世纪60年代中期，狂飙突至，把生活在完全不同世界里的几个青年人抛到了一处。从高于公寓和从市井里弄走出来的男女主人公们，带着青春的热情、敏感、躁动和迷茫，顽强而莽撞地为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寻找理由。他们的故事，构成了一部“老三届”的精神成长历史。

读王安忆的文字，须耐得住性子，太急、太躁不行。她的叙事是绵长细碎的，再紧张的事，都显得有条不紊。你看《长恨歌》、《桃之夭夭》，哪一篇不是金沙深埋般的宁静。前段时间，读长篇小说《遍地枭雄》，感觉她的文字里深藏着静气和喜气，《启蒙时代》亦是如此。想想看，“文革”在很多人的眼里是充满血腥和暴力的，而她的文字是忧伤的美，不经意掩盖了这血腥和暴力，透出更深奥的生活哲理，这不能不归功于王安忆炉火纯青的叙述功夫。

王安忆以理性、精致、绵密的笔触，解剖和描述了这几个上海年轻人的成长。当年，他们狂热迷恋马克思的著作和各式各样的革命理论，激情燃烧，理想膨胀；又逐步在真实的世界里，发现了理想与空想的区别，从热衷于生硬的教条到自觉地去感知有温度的生活。作家保持了一贯的冷静，并没有去描写风起云涌的“运动”，即使是描写冲突——父子之间、阶级之间，青春的躁动、越轨等等，也是波澜不惊，静水深流，发人深省。小说表现出很明显的思辨性。小兔子、南昌、陈卓然、小老大、阿明、嘉宝、丁宜男、舒拉，这些生在特殊年代、经历了一系列特殊事件的少男少女，他们无时不在思索着革命、理想、人生等重大问题。他们狂热地迷恋马列主义著作和各式各样的革命理论，青春的激情像火山熔岩一样四处喷发。但他们又是孤独、苦闷的，在现实中找不准自己前进的方向。他们急需诉说，急于找到答案，于是在青春单纯的底色上，他们



用自身的体悟，在心路历程上划出了一条条思辨的轨迹。王安忆把这些并不成熟的思想碎片努力拼接起来，形成一幅较为完整的“老三届”精神地图。

王安忆作为一个出身干部家庭的“后老三届”作家，对那一段生活有着切身的感受和深入的思考。她写过多部以“老三届”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启蒙时代》可以说是最深思熟虑、最深刻的一部。不管是不是“老三届”读者，只要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读了《启蒙时代》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共鸣感，勾起对往昔岁月的回忆与反思，因为那个时代的经历，已经深深刻在人们的心上，那既是一种磨难，也是人生的一笔财富。王安忆没有去渲染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变故，而用力在刻画当时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下，一代年轻人的头脑、心灵和命运，这就是这部小说的深刻和独到之处。至于今天的年轻读者，也可以从中了解到与他们今天生长的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从而加深对自己父辈的认识和理解，亦更加珍惜今天这已真正发生了翻天覆地巨变的时代和生活。正如王安忆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这是一部描写一代人成长的心灵小说。我大约是和小说中的“舒拉”同代，于是就做了一个旁观者，看着“前辈”如何应对时代和生活的复杂性。而且我不以为这是一个“回望”，它依然是“现在”，许多同样性质的思想今天还在活动着，表面的形态也许变了，但内里其实还那样。”

“没有哪个年代的青春是轻松的！”王安忆的这句话相信许多人都会有同感。就我本人所经历的青春而言，并不轻松，或者说，看似轻松，实则沉重。青春的表象和内质是悖反的，靓丽如花的背后也有迷惘的阴影，轻盈快乐的背后亦逢失意悲观，崇高理想面对的是极其平凡的日子。在渐渐远离青春的季节，读王安忆的这本《启蒙时代》，时光好像在一点点回溯。即使我并没有经历那个时代，对那个年代的所知也只是一鳞半爪，但小说中那一群生机勃勃又无所适从的年轻人，他或者她，分明就是当年的我。

真实的平凡 ——评小说《平凡的世界》



◎刘小溪

当代文学有两个圣徒，一个是海子，他说：“终生的目标是成就诗与真理合一的大诗”；一个是路遥，他说：“我必须在40岁以前完成一桩事业——写一本大书”。路遥留下的大书就是《平凡的世界》。这是一部长盛不衰的小说，但在正统文学史上却没什么地位。路遥曾经在他艰苦的写作历程中说：“你之所以还能坚持，是因为你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发起的一项“到现在为止对被访者影响最大的书”的调查结果，前3位分别是《红楼梦》、《三国演义》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平凡的世界》排在第6位，在调查公布的前28部作品中，没有其他的1980年以后的当代小说。这一调查表明路遥的确赢得了“读者上帝”的青睐。

《平凡的世界》在读者中深受欢迎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部作品对农村生活的真实描写和主人公艰难奋进的个人经历在读者中引起极大的情感共鸣，那些如梦魇般的生活经历通过一个个精雕细镂的细节描写，如“吃饭”的细节、“揽工”的细节、种种“活人”的细节等等。勾起有相似经历者刻骨铭心的记忆。尤为可贵的是，路遥在创作中始终要求自己“不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他不是像“民粹派”、“启蒙者”那样“到民众中去”，而是“从民众中来”，他自身的形象经常是与笔下的典型人物形象——浑身沾满黄土但志向高远的“能人”、“精人”合二为一。

《平凡的世界》里那扎扎实实的现实描写背后有一种非常光明乐观的信仰：聪明、勤劳、善良的人最终会丰衣足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书中一个个推动故事发展的情节安排，孙少安、孙少平不断获得善人的帮助、



大人物的赏识、润叶、田晓霞等“七仙女式的爱情”都是基于这种信仰，这给了读者极大的心理满足和阅读快感。

《平凡的世界》写的是1975年到1985年期间北方农村的变迁史，酝酿、创作于1982年到1988年这6年期间。这段时间内应该说是农村发展的“黄金时代”。土地所有制改革刚刚实行，在饥饿线上挣扎了多年的农民有望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后来越来越恶化的农民不堪重负被迫外出打工、社会腐败和不公现象益发严重的情况此时还没有出现。正是这样一个相对的“黄金时代”的生活基础，奠定了这套朴素信仰的“光明内核”：社会虽然有无数的不公正，但通过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终能获得成功和幸福。

故事发生在七八十年代的黄土高坡上一个叫双水村的地方，整部小说都是在描写双水村及村里人的变化。在那段年代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邓小平的上台带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潮流。路遥，作为一位乡土作家，在这部小说中，力图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文字展现当时中国的社会，双水村及双水村的人就是当时中国及中国人民的缩影。

《平凡的世界》，一本那样平凡而真实的书，只是在那个黄土高原上一个不起眼的双水村的小寨，没有惊天动地的厮杀，只是在默默的诉说里倾诉着融融的亲情，没有荡气回肠的情节，只是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里娓娓诉说着，平凡的世界里平凡人们平凡而又特殊的人生，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的海誓山盟，只是在把爱的种种用那陕北风情徐徐道来。

《平凡的世界》描绘的是一幅爱的篇章，对亲情的爱，少安与他的父亲：当他在参加全县升初中的考试中，名列第三被录取的时候“他的父亲在他面前抱头痛哭流涕，他第一次看到刚强的父亲在他面前流泪，他自己也哭了，是的，他将要和学校的校门永远的告别了，他多么的不情愿呀，他理解父亲的痛苦——爸爸不愿断送他的前程……”或许，我们的印象里，父亲总是高大与坚强的象征，又有谁能够明白那笑容背后的艰辛与无奈？可是少安知道，为了那个家他牺牲了太多太多，没日没夜的忙碌着，从来没有自私过。他是一个多么有情有义的男子汉啊！还有妹妹兰香与少平、少安的兄妹情谊，一个平凡的环境，一个一包乱的家却只因那相扶相携的亲情而变的富有。

《平凡的世界》也写友情，那田润叶和孙少安的那些细腻的爱似乎掺杂的是爱的成分，但只到了每个人都接受了现实，秀莲与少安草草结婚，田润叶嫁给了李向前那一刻，回顾起两人曾经的那一抹朦胧的情愫来却成了至死不渝的友谊了，还有金俊武与孙少安的那种沟通，只是在那个黄土高原上两个平凡的男子汉之间那种心与心的理解，他们没有高谈阔论的去谈个人理想，也没有不切实际的侃未来，只是介于他们的背景，他们的现状，以及他们承受的和面对的种种相似——一缕基于相同背景下的无限深情的理解与支持。

《平凡的世界》里着墨最重的是主人公孙少平，那个黄土高原上有着成熟思维，脚踏实地，重情重义，忍辱负重，不卑不亢的少年，那种上进求尊严，从不好高骛远的情怀也深深的打动着少女的芳心，田小霞的出现，让我们的主人公人生有了目标与方向，从此他也可以用自信的心去面对，小霞一度上是他精神的最大的支柱与鼓舞，让他有了奋起的支点和勇气，成为一盏照亮前进路上的灯，他们的爱让人奋进，是向上的，在物质上他们没有要求太多，在精神上却相扶相携，那是跨越了所有的界线——心与心的交汇。我认为这才是爱情上最真挚的追求，这也正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们所缺少的。

然而随着路遥的笔锋一转，我们的主人公孙少平那曾经视做生命全部的爱却因田小霞的牺牲而破碎，小霞的死带走了孙少平那一缕生活的阳光，所有的幸福，尽因这个善良的女孩儿的走而一去不返，曾经的快乐与相知，理解与相携，幸福甜蜜的都已不在了。或许这便是命运，这就是生活，有甜蜜也会有苦涩，有幸福也会有破灭；尽是快乐尽是完美，那不是生活，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人们，平凡的生活，人生就是这样子的现实。

与田润叶与孙少安的爱相比，他们至少爱的勇敢，爱的执著，爱的坚贞，爱的热烈，当

然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里，少安与秀莲的相互扶持，只为生活而一起走过也是那样的真实，还有田润叶和李向前的爱，初一见似乎让人难以理解，可当你仔细的读下去，润叶的那种近似于固执的执著，在那个平凡的世界里是那样的真实与贴切。还记得少平那美好而寒酸的初恋，却是靠最简朴的饭食而引起的同病相怜；还记得少平和晓霞那若即若离的恋爱，向世人宣告了爱情的伟大；还记得少平被郝红梅抛弃时的冷静；还记的晓霞随洪水逝去时少平的沉痛……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彼此都从对方那里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

在这些平凡人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真挚的感情，是顽强的意志。谈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了小说中第六章的情节……孙少平和郝红梅这两个贫困的高中生在我的脑海里扎根。他们拥有一样的命运，都是穷苦百姓家的孩子，都吃不起“欧洲”——白馍，也吃不起“亚洲”——黄馍，只能在别人打好饭之后，去拿自己的“非洲”——黑馍……多么的可怜，又是多么的可鄙！他们很可怜，因为他们和其他同学一样在这个校园中生活，但却过着差之千里的日子！他们也是年轻长身体的时候，但是却不能吃上稍有营养的乙等菜，甚至连丙菜都难以供应！他们又是那么的可鄙，因为他们的自尊心太强了。穷，并不是错吧，为何不能大大方方的前去打饭呢，自尊心，虚荣心。这就是人，可怜，悲哀！少平去拿自己那不够填饱肚子的“两个非洲”时，看到菜盆里残留些菜汤，便盛往自己的碗里……“房檐滴着水，使辣子油溅得到处都是，少平的眼睛里充满着泪花，我们姑且认为是里面溅进了辣子油吧。”

我们的主人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着、学习着，现实的残酷没有打消他前进的意志，没有泯灭他人性的良知，没有减少他读书的动力。他想尽一切办法读书，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牛虻》……而且还将这些书借给与自己同病相怜的郝红梅……故事还在继续，但是他们的命运似乎并未改变。

平凡的世界，平凡的生活，平凡的人们，只有平凡的才是大众的，也才是最真切的，真正的生活是平凡的。是的，生活是平凡的，人生是平凡的，想一想人生就是那么短短的来去一瞬，与其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索取，不如将我们平凡的人生付诸平凡的生活，或许这样子才是最为平凡最为真实也是最为幸福的感觉。

绝对小孩



朱德庸著

◎ 梁艳红

凭借《涩女郎》、《双响炮》、《醋溜族》等享誉华人圈的台湾漫画家朱德庸在杭州“第三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朱德庸日”联合浙江卫视推出新作《绝对小孩》。《绝对小孩》作为朱德庸擅长的四格漫画，依然采用极为流畅的笔触，但与之前作品不同的是，《绝对小孩》画的都是孩子，所以笔法更活泼更有趣也更幽默。让人领略到了朱德庸另样的才能，被誉为朱德庸 20 年最好玩的一本书。



他，目前 40 岁，学电影的，却在 29 岁以后变成专业漫画家，而且是漫画大家。他的四格漫画已成为华人世界的幽默经典。据估计，每天都有数千万华人在早餐桌上对着朱德庸漫画深深发笑。他的《双响炮》、《醋溜族》、《涩女郎》漫画系列，在台湾已卖出近两百万本，在东南亚盗版更有 56 种之多，1999 年他的漫画正式授权中国大陆市场，一年多就卖出 200 万本，现在已成为大学生与新兴白领族、网络族的热门话题。

这本被誉为朱德庸二十年最好玩的一本书，是朱德庸首次选择小孩作为漫画主角的作品。朱德庸称，《绝对小孩》是在其事业最困难期间创作的，漫画的灵感来源于自己的孩子，因为“每个人的心中都藏有一个绝对小孩”。朱德庸说：“当我们跟自己童年的距离越来越远，其实某种程度也就失去了自我，因此每个人都要转过来拥抱童年。”于是，在画过了暗藏硝烟的办公室、画完了单身男女的都市、画尽了夫妻的家长里短之后，朱德庸一个转身，开始讲起了孩子们的故事。在《绝对小孩》中，朱德庸用一贯幽默诙谐的画风和文字描绘出了小孩眼中的世界，以及小孩世界和大人世界的拉拉扯扯，展现了6个古灵精怪、各具特性、出人意表的“绝对小孩”的“绝对生活”，包括6个小孩之间、他们和大人之间、他们与麻烦之间的绝对精彩故事，以及绝对的经典对白。通过这群“绝对小孩”的单纯和不加掩饰的视角，折射出了作者对成人世界的反思：大人的世界不再好玩！不再纯粹！朱德庸认为，这个世界不是绝对的，只有这些小孩是绝对的！漫画作品上市后，五毛、披头、讨厌、比赛小子、贵族妞、宝儿，六名主角让大陆读者格外青睐，迅速培养了一批“绝对小孩迷”。

《绝对小孩》某种程度上让朱德庸重新拥抱自己不悦童年，并且想出成长的真意：让我们每个人都当小孩，都顺应自己的本性，不要压抑伪装，选自己认为对的去做，生命总有一天会回头来反问自己要的是什么？这本书，也是朱德庸有史以来，对自己最深刻的观察。朱德庸说，祝愿所有的读者，在看完《绝对小孩》之后，能让自己的内心每天再做一次小孩！

现代语言学的基石

——《普通语言学教程》

◎ 李晓凌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1857年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学者世家。1875—1876年在日内瓦大学学习物理学和化学；1876年加入巴黎语言学会；1876—1878年转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历史语言学，在那里结识了青年语法学派的重要人物布鲁格曼、奥斯脱霍夫等人，和他们共同从事印欧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工作。1878年发表了他的成名作《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1880年以论文《论梵语绝对属格的用法》获莱比锡大学最优生博士学位。1881—1891年他在法国巴黎高等研究院任教，讲授历史比较语法，培养了众多的比较语言学专家。1891年回国担任日内瓦大学教授，讲授梵文和比较语法。从1907年起，他曾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但没有写成讲义，1913年他因病去世后，他的学生巴利和薛施葛根据同学们的笔记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



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该书提出了以“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为标志的一整套新的理论和方法，对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设定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范畴，成为20世纪语言学乃至人文科学研究的标准语言。

《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在日内瓦出第一版，1922年在巴黎出第二版，其后还连续出了第三版和第四版，1949年出第五版，各国语言学家先后把它译成德、西、俄、英、日等国文字，使它的影响遍及全世界。中译本于1980年出版。

全书从序言到索引和目录，一共只有331页。其中除“绪论”外，分为（一）一般原则、（二）共时语言学、（三）历时语言学、（四）地理语言学、（五）回顾语言学的问题等五部分。

“绪论”简单叙述语言学的历史和它与其它科学的关系、语言学的对象、言语行为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文字表现语言和音位学。

一般原则部分主要讲语言符号的性质、符号的不可变性和可变性，以及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中的种种理论问题。

共时语言学分八章，除概说外分别论述语言系统的结构原则；同一性、现实性和价值；语言价值；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语言的机构；语法及其细分和语法中抽象实体的作用等。

历时语言学也分八章，除概说外分别叙述语音的演变；语音演变在语法上的后果；类比作用；类比与演化；流俗词源；粘合作用；历时的部件；同一性和现实性等。

地理语言学分四章，分别论述语言的差异；地理差异的复杂情况；地理差异的原因和语言波浪的传播。

最后，回顾语言学问题部分分五章，分别叙述历时语言学的两个情景；最古的语言和原始型，重建，人类学和史前学中的语言证据，以及语言系属和语言类型。

一般原则和共时语言学两部分是全书的核心，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新理论、新方法基本上都集中于此。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重要贡献主要是：

一. 区分语言和言语，其著名公式是：言语活动=语言+言语。言语活动除去言语，剩下语言，这才是“语言学的又完整又具体的对象。”

二. 区分共时和历时。这是继区分语言/言语后的“第二条分叉路”；是第二个“两条道路的交叉点”。

三. 符号理论。索绪尔最早指出，语言符号联系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语言符号是一种有两面的心理实体”，他用“能指”和“所指”这两个术语来分别指称符号的“两面”，并进一步提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和线条性的特点。

四. 系统理论。索绪尔提出“语言是一个在其内部一切都互相联系的系统”，有“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类关系。他创立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如“差别”、“对立”、“价值”、“实质”和“形式”，使“系统”的概念超出了分类和描写的狭隘框框。

五. 符号学、音位学及其它

1. 今天，一般认为符号学和语言学是两门科学，虽有联系，但彼此独立。符号学却肇源于索绪尔的《教程》：“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我们管它叫符号学。”

2. 现代语言学中的音位概念，也源出于《教程》。他关于“系统”的一个定义已包含了音位理论的基本思想：“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它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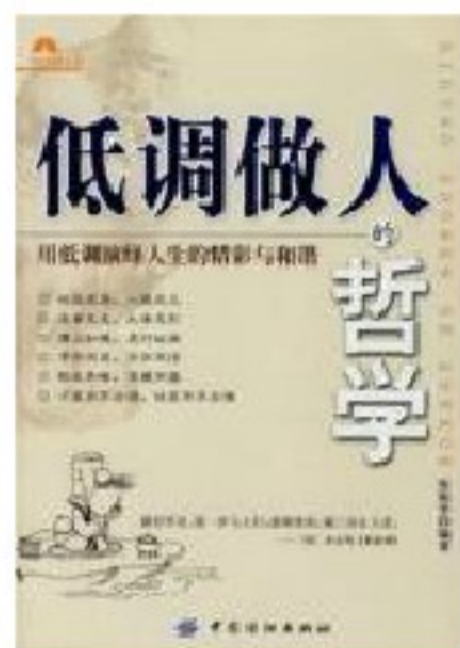
3. 《教程》还有论述外部语言学的内容。在索绪尔看来，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语言的方法，前者按照语言“自己固有的秩序”研究语言，而后者是从语言学和其它领域的关系上去研究语言。

要对他的这些概念的含义有个大致正当的理解，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读读索绪尔本人的论述，即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这些论述既简洁又丰富，阅读这样的大师，差不多每一页都会有收获的。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总体思想的系统的阐述。他的思想光辉一直照耀着语言研究的历程。像历史上所有的著名思想家一样，他为人类留下了一份具有永恒价值的学术遗产。

低调做人 的 哲学

◎王艳



最近看了张振学写的《低调做人的哲学》这本书，感受很深：一个人不管取得了多大的成功，不管名有多显、位有多高、钱有多丰，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也应该保持做人的低调。有道是：地低成海，人低成王。低调做人不仅是一种境界、一种风范，更是一种思想、一种哲学。这本书以独到的人生视角、辩证的思维方式深刻地阐述了低调做人的社会意义，从而为人们更好地做人做事、成就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哲学启示和思考。

低调做人不仅是一种境界，一种风范，更是一种哲学。绝大多数成功者都或多或少受到过这一哲学思想的启示。有位著名的商界巨贾曾给自己的儿子开出了一条训词，道是：“树大招风，低调做人。”可见，低调做人不单是普通人的处世圣经，更是成功者的做人训诫。

从某种意义上说，低调做人也是成功者的行事规则。在一般人心目中，所谓成功者多指那些出了名、升了职、赚了钱的人。他们的人生光彩四射，炫人眼目，风光体面，令人艳羡。殊不知，越是出人头地，越应该学会低调做人。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谁都没有条件和资本把风头出尽，把风光占尽，把风采夺尽！如果有谁想试图占尽这一切，那么，他就违背了低调做人的规则，就会因此而撞墙头，跌跟头，碰霉头，掉链子，丢面子，窝脖子！想想《菜根谭》上有句话也许更耐人咀嚼：“路径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的，减三分让人尝。”世界之大，人际之繁，何必把自己抛到风头浪尖上呢？何必让自己趾高气扬和威风八面地在别人的眼球里晃动呢？

不错，谁都渴望成功，但成功不是冲别人炫耀的资本，更不是向别人招摇的旗帜。让别人也能在你成功的背影中有一次轻松的喘息和体面的小憩，而不要让别人在擦干自己失败的眼泪后看到你成功的傲慢和凌驾于众人之上的那份潇洒、体面、尊贵和张狂。学会放低自己的身段，放下成功者的架子，收敛不羁的言行和轻蔑的眼光，努力夹起自己的尾巴，也许会使身边的人更有面子，更有尊严。不要用自己的好汉姿势去证明别人的懦夫形象或激发别人自惭形秽的感觉。从这一意义上说，低调做人更是一种强者行走社会的哲学！

古今中外很多能人伟人都是低调做人的典范，他们的成功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同、支持和美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耳闻目睹了个别成功者在无休止的张扬和卖弄中不知收敛，因树大招风而招致诋毁和劫难，以致前功尽弃，威风扫地，无以自保，这该是多么不明智啊！所以，面对这个云谲波诡的世界，只有懂得低调做人的人，才能在社会的舞台上演好每一个角色，在人生的旅程中走好每一段路。

德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智慧的德；另一种是行为的德。前者从学习中得来，后者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



丹青难写是精神

——访大连民族学院副院长杜元虎

张敬荣：听说您是该校引进的第五位博士，经历了学校教育教学事业快速发展的主要时期，请谈一谈您对学校近年来发展建设成就的感受。

杜元虎：1998年，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一般力学专业取得博士学位后，来到该校应聘并于1999年正式调入学校。当时，学校正式建校才2年多，学校的主要教学、办公建筑只有第一教学楼、生物楼、行政楼（现经管学院楼）和成教楼，图书馆刚刚竣工，教职工200多人。如今，学校已发展成校园建筑总面积30余万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总值7亿元，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1.4亿元，教职员千余人，在校生13,000余人，拥有涵盖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等六个学科门类、40个本科专业的多科性民族大学。位于大连市国家5A级旅游度假区的金石滩校区也于今年正式投入使用。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学校党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发展第一、实践第一、群众第一的观点，围绕培养高素质人才、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的现代化民族大学的目标，与时俱进，艰苦奋斗，真抓实干，团结和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共同奋斗的结果。作为学校快速建设发展时期的亲历者，我感到十分自豪。同时，也以自己不懈的努力，为学校事业的发展贡献着一份力量。2002-2006年间，我担任学校教务处处长，参与了学分制改革、综合教务管理系统建设、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建设、教学改革七项建设工程等教学建设工作；2006年3月，被任命为学校组织人事部部长，2008年6月任副校长，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实现学校“质量立校，科技兴校，人才强校”战略忠实地履行着职责。

张敬荣：作为主管教学的副校长，请您具体谈一下学校教育教学建设的主要特点。

杜元虎：大连民族学院秉承“立足沿海，服务民族，应用为主，教育创新，质量立校，因材施教，团结和谐，全面发展”的校训精神，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目标，十分重视思想道德品质、科学文化素养与健康人格培育，重视传授宽、厚、新的综合基础知识、系统性与先进性的专业知识，重视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

学校师资队伍中26%的教师具有博士学位，86%的教师具有硕士学位，师资队伍是高水平的；学校拥有总值1.2亿元的教学科研设备以及设施优良的多媒体教室，教学环境是优良的；学校设计了课内外一体化的培养方案，多样化开放性的实践教学体系，启动了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培养工程，教学理念是先进的；学校建立的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大学生创新实践教育基地、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大学生身心健康教育基地，为学生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60多个学生社团，演绎着丰富多彩的课余文化生活。

张敬荣：在承担繁重的行政工作的同时，您几年来一直坚持为本科生上课，请您谈一谈您的治学理念。

杜元虎：教育规律告诉我们，教学质量包含着教与学两方面的内容，是一个统一体。仅有勤奋好学的学生而无德高艺深的教师，或光有高水平的师资和优秀的授课艺术而无勤奋好学的良好学风，都不可能达到高的教学质量。因此，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教与学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两者要相互配合。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十分注重对学生的言传身教。我指导学生做毕业论文时，学生说“老师太认真了，我们错的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我说是因为我的博士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文虎教授就是这样给我改论文的。“千教万教教人学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张敬荣: 未来的社会具有知识与技术更新速度加快、职业转移频繁等特点,您认为大学的素质教育应如何定位才能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

杜元虎: 素质就是通过知识和能力内化为一种品格,素质教育就是使知识和能力更好地发挥作用。

重视和加强素质教育需要我们进一步转变教育思想与观念,真正树立市场导向、社会需求导向的思想观念,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思想观念,专才和通才有机结合的思想观念,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思想观念,树立质量意识、竞争意识和忧患意识。

面对快节奏变化的社会,基本的办法有两个:一是以不变应万变,二是以变应变。

“以不变应万变”,首先指的就是基础素质。一般而言,基础是相对稳定的,对大学生的基础要求比较扎实,比较宽厚。好比一幢楼房,基础越厚,楼房就可以做得越高,没有扎实的基础,就会倒塌;好比一棵大树,根一定要扎得很深,根深才能叶茂。学习也是一样的道理,其基础打得好才能成大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后劲”。

“以变应变”,就是要树立创新教育的思想。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比较习惯于传递现成的知识,采用传习性、因袭式的教育方法。很少鼓励学生探究问题。这种教育指导思想极大的制约了学生智力的培养和独创性地发挥。因此,重视实践(实践环节),研究问题(论文),是减少传习教学、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两个重要方面。美国学者S·阿瑞提所著的《创造的秘密》一书中强调指出:“创造性思维基于实践始于问题”,应当让学生从书本和课堂中适度解放出来,多参加实践,多接触问题。

在实施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同时,特别需要处理好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和综合提高的关系,思想与业务、理论与实际、学习与健康的关系,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注重拓宽基础教学的内涵,加强通识教育,改变本科教育内容陈旧、范围偏窄、偏专的倾向,加强包括自然科学、艺术、美学、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教学与基本素质的培养,使学生通过学习构建起可适应终身教育与社会发展变化需要的知识、能力结构和艺术素质,使学生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

希望同学们珍惜在学校的美好时光,善于把校园内的知识、信息以及各种资源和条件转化为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在这个充满现代气息的校园里,名师荟萃、群贤毕至,儒静典雅,海纳百川,相信大家一定能把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装扮得有声有色,绚丽多姿。



杜元虎教授简介

杜元虎,男,汉族,1962年12月出生,工学博士,教授,中共党员。现任大连民族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专家系统设计、旋转机械的故障诊断、早期故障预报、分布式人工智能、车辆性能测试技术等工作。

1979年9月考入黑龙江工程学院,毕业后,在黑龙江省森林工业管理干部学院任教;1986考入东北林业大学机械系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东北林业大学测试中心助理研究员、机动车安全技术检测站副站长、副研究员、测试中心副主任,黑龙江省汽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副站长;1994年3月—1998年7月期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工程与力学系一般力学专业,在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文虎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旋转机械故障诊断技术研究,获工学博士学位。

工作期间曾任黑龙江省汽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机动车检测研究会理事、黑龙江省振动工程学会理事、全国林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现任辽宁省振动工程学会副理事长。

1999年9月，调入大连民族学院机电信息工程系任教师，2002年1月任教务处处长，2006年3月任组织人事部部长，2008年6月任副院长。

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参加并完成了10余项科研、技术开发工作，获国家、省、部级奖励3项。



栏目主持：包和平
郭军

倾心育桃李 真情写未来

——访机电信息工程学院徐国凯教授

刘小溪：徐教授您好！在迎来十年校庆之际，能够采访到您，非常荣幸。您是在我院正式建院前就来到这里的，能谈谈您这十几年来工作的变化么？

徐国凯：我是1995年来到大连民族学院的，那时候叫东北民族学院。1997年我担任机电信息工程系副主任，主管教学；1999年出任机电信息工程系主任，2005年担任机电信息工程学院院长。

刘小溪：您担任教学和管理工作这么久，一定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请您谈谈您现在最关注的问题或是您目前正致力完成的工作是什么？

徐国凯：我院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刚刚结束，我在本科教学评估专家组召开的先进班导师座谈会上谈到了这个问题。作为老师，不但要思考怎样做老师、做好老师，还要更深入地思考如何做好职业化的教师，怎样更好地教书育人。

刘小溪：您提到的职业化的教师是个新概念，为什么提出这个职业化的教师的概念？能给我们详细谈谈么？

徐国凯：职业化的教师可以说这在我们校内是个新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提出是基于我这些年来做教学工作的体会。我们学院是个以教学为主的教学型学校，在多年的工作中，我觉得在教学型学校里，如何做个好老师，做好职业化的教师，是非常重要的。

职业化的教师有三点内涵。

第一，教师要具备敬业精神。这一点我是受到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的启示。职业篮球运动员，不单是打球，而且是把打球作为毕生的追求，为之奉献出全部的精力，对篮球运动精益求精，甚至把它作为一种信仰，为之奋斗。这种敬业精神正是我们作为教师所应具备的。作为职业化的教师，也应该把从事教师这一职业作为毕生的追求和努力的方向。

第二，要具备专业化的水准。作为职业化的教师，不只是能够上课。在教学改革中要能够创新，提出切实可行的教改目标；答疑，不仅仅是回答学生问题，要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对学生的认知水平有个准确的评价，因材施教，提高学生学习和科研的兴趣；批改作业、出试题等方面都要有专业化的水准。凡是教师该做的都要能够做，并且做好。简单说，就是教学工作的所有环节都干得地道。

第三，全方位的能力。作为民族院校的教师，对少数民族学生，要有独特的教育教学方法，要因材施教，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同时要在科研上也有自己的建树，教学、科研齐头并进，两条腿走路。在做班导师工作上，能够积极主动地了解学生的动态，不但是教书，还要育人，会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擅长指导学生选课，指导学生成才。

虽然，这个目标不是短期就能够实现的，但是我们需要有这种成为职业化教师的意识，才能够朝这个方向努力。有着这样一个方向，大家才能在不足之处多下功夫。职业化教师的提出是我们总结十年来工作经验和教训的结果；培养职业化教师的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这不仅需要我们的团队长期合作，互相支持，同时也需要学校的大力支持和推广，不但在我们机电信息工程学院形成一支过硬的教学队伍——“铁军”，而且要在全校范围内形成大的风气和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有了好的教师才能带动学风建设，这是造福民院学子的一件大事！

刘小溪：对培养职业化的教师，您有哪些具体的设想呢？

徐国凯：对教学工作中还不能够完全胜任的教师，要帮助他们选择合适的切入点，积极调整和改正，带着他们前进，从整体上提高全院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对于在科研上有困难的老师，帮助他们确立可行的科研方向和课题，并坚持下去；对本科毕业的教师，有计划地安排进修学习，提高知识水平和科研水平；对于青年教师的促进工作，我们采取了一帮一，老带新的方法，从四五年前就开始了，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最近一两年学校也开始采取这些方法提高教师素质了。

对于教师队伍建设初步的设想是建立一支职业化的教师队伍，在此基础上，我们的教师，不但能够上课，还能够作科研。在申硕以后，我们的教师不但能够做本科生的教师，还要能够做硕士生导师。

刘小溪：徐教授，我们看到机电信息工程学院的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是非常喜人的，您认为哪些因素决定着大学生就业的程度呢？

徐国凯：就机电学生而言，就业主要是专业技能的问题。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主要有三方面因素：1、实验室的设备，是否为学生实验学习提供充分的实验条件。2、实验课题的设置，对学生利用和掌握实验设备，积累实践经验是十分关键的。3、教师对学生实验技能、技巧和结果的要求，也影响着学生对该技术的掌握情况。



徐国凯教授简介

徐国凯，男，汉族，1956年10月26日出生，黑龙江人，工学硕士，1988年毕业于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秦皇岛分校（现名燕山大学）电力拖动及自动化专业。现任大连民族学院机电信息工程学院院长，学校优秀教学带头人。

研究领域及方向：自适应控制理论及其应用：主要研究各种实用的控制方案及其在运动系统中的应用；电力电子技术及其应用：主要研究电动汽车的变频器及传动系统的设计与制造。

徐国凯教授长期从事电子信息工程和自动化专业的教学工作，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较强的教学研究能力。先后主讲过研究生课程：《线性系统理论》和《自适应控制理论》，本科生课程：《电路原理》、《电子技术基础》、《自动控制原理》、《电动汽车概论》和《电力电子技术》。曾为多位本科生指导过毕业设计。

辛勤耕耘在教学第一线，认真实践教书育人宗旨，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学科发展、实验室建设、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多次获得校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大连市优秀教师和部级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提出了机电信息工程学院的育人理念：素质铸就成功，创新引领未来。

主持辽宁省精品课《电子技术基础》的建设。和课组成员一道积极探索改进教学模式与方法以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新途径。提出并实施了“学习与训练并重，通识与创新结合”的教学模式。发表了多篇教学改革论文，实现了网络辅助教学，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手实践能力。由于课组的示范与带动作用，课组所在的电子工程系被评为“大连市三育人先进集体”，并被推荐为“辽宁省优秀基层教学组织”。电子工程系党支部被评为“辽宁省高校先进党支部”。

所主讲的《自动控制原理B》连续3年被评为A级课程。所开发的《交流调速系统CAI课件》曾获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所主持的课题《新建高校机电信息类专业平台构建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获得了校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目前正在承担1项校级教改课题。

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在自适应控制理论的实际应用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提出了自适应控制器的程式化设计方法，为工程技术人员掌握先进控制手段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先后在《控制理论与应用》等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1部，获省市奖励多项。正在主持辽宁省科技基金等4项省部级课题。尤其是《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刚刚荣获2007年度省级精品课程称号。目前受聘于东北大学，承担校外硕士研究生导师工作。

中国近代十大出版家

1.张元济——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先驱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中国近代最为著名的出版家、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先驱。著名作家茅盾晚年在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写到：“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原则、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的著作，但有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书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他早年参加维新变法运动，政变失败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后南下上海，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1902年加盟商务印书馆，先后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事、董事、董事长等职。在他的领导下，商务印书馆成为解放前我国最为著名的文化出版重镇，为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解放后，仍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并兼任上海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

2.雄才大略创[中华]——陆费逵

陆费逵（1886—1941），字伯鸿，号少沧，我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他毕生献身于文化出版事业，为我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于民国初年创立的中华书局，是我国解放前最为著名的两大民营出版机构之一，对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的普及发挥了重大作用。长期以来，中华书局一直承担着我国文史类等传统学术图书的出版重任，成为我国出版界的知名品牌。陆费逵对中华书局的经营理念 and 执着精神是我国近现代出版业不朽的精神财富，有许多方面值得人们认真总结、回顾和借鉴。

3.商务出版巨匠——王云五

王云五（1888—1979），我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他曾先后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1921—1929）和总经理（1930—1946），主持商务出版事业长达25年之久。在他主持商务期间，数度将商务转危为安，并且把商务出版事业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使得20世纪30年代的商务印书馆非但雄踞国内出版界之首，而且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大出版机构。晚年致力于台湾商务事业，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未完待续……）

大连民族学院图书情报委员会 主办

主 编：包和平

副主编：刘江龙 王学艳

编辑部主任：郭 军 陈新颜

编辑部：王 波 闫海新 沈鹏远 宛文红

金英玉 金 玲 张敬荣 郑巧红

本期责任编辑：张敬荣 陈新颜

地址：图书馆

电话：87656275 87656290

邮编：116600

电子邮件：shuping@dlnu.edu.cn

（内部使用 发送校内各部门）